

# 辩论史记

朱琼娟

楔子

首届全国高校“理律杯”模拟法庭辩论赛已然落下帷幕，七个奖项：辩论冠、亚、季军，两份最佳书状奖以及两个最佳辩手奖中，武汉大学代表队一举夺得了三个奖项：辩论赛冠军、一份最佳书状奖以及一个最佳辩手奖；此外，还第一个捧回了“理律杯”比赛的流动杯，真可谓硕果连连！我，作为武汉大学代表队的一名参赛队员，同时也是本次比赛的“最佳辩手”，激动之情更是自不待言。时值今日，每当看到比赛时的照片，每当与昔日的队友相聚时，心中便生有万分的感慨：训练时的头前尾后，比赛时的台上台下；争执时面红耳赤的激烈，胜利时情不自禁的泪水，还有那无数次的欢声笑语……，一切都仿佛昨日才发生过般的鲜活与清晰，让我割舍不得也忘却不掉——记忆是个无底的黑匣，珍惜的人们爱把美好的日子装进去，却怎么也填不满；而每当打开珍藏的黑匣时，却再也舍不得关上了。我也不例外。

## 一、误入辩论队

去年的国庆节，我也是在家里过的，跟往年一样仍不得轻松；但是，与往年不同的是，去年是在准备全国的统一司法考试，而往年则是一直在为模拟法庭辩论赛而忙碌。

提起模拟法庭辩论，我似乎是情有独钟的——连续两年参加国际模拟商事仲裁庭比赛。去年四月份，国内非典正猖獗时，我和其他三名队员在肖永平教授的带领下去了维也纳。在那次比赛中，我见识到了科隆、哈佛学生的风采，也开始隐约懂得法庭辩论的“道”与“术”。而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当属科隆大学的一位上场队员：他扎实的法律功底，谦和温雅的谈吐；他对于案件每一个细节的周详见解；他微侧向仲裁员的坐姿，应对自如的回答，随时翻开手边书籍信手即用的优雅，是我始终在追寻的感觉……

言归正传，就在我对着砖头一样的备考资料两眼发直时，接到了院里的一个电话：“小朱，有一个模拟法庭比赛，参加吧。”

“恩……我在准备司法考试。”

“没关系，不冲突。”

“恩……那好吧。”

电话挂了，愣了半晌，我才突然想起还没来得及问是关于哪方面的比赛。他们好像是看准了我对模拟法庭辩论的兴趣，知道我是来者不拒的。

这学期又有的忙了，我心中暗自想到。

然而，事实比我想象中的要难得多！

第一次的正式聚会安排在司法考试前的第三天，由温世扬副院长主持：“这次比赛，我们武汉大学法学院报名的比较晚，所以来不及进行选拔，就暂且决定由你们几位参加。廖诗平，01级国际经济法的硕士研究生，你们的大师兄；易仁涛，03级经济法的硕士研究生，

法学院辩论队的队长；朱琼娟，03级民商法的硕士研究生，参加过两届模拟商事仲裁辩论赛；吴文芳，00级的本科毕业生，法学院辩论队的主力。你们的领队是张善斌老师，他工作很细致的，以后日常事务都由他负责安排。”

温院长简洁而又清楚地介绍了即将与我共事两个多月的老师与队员们。其实，这些人对我而言并不陌生：易仁涛和我本科就是同学，四年里，在辩论队中摸爬滚打成长起来，不久前还带队获得“天伦律师杯”湖北高校法学院法学辩论赛的冠军；吴文芳，比我低一年级，所以对她，我也是知道一些的。在院学生会的竞选中，她干练、爽直的作风赢得了不菲的票数，使她成为了主席团的一员；张善斌老师，是我们民商法的导师，我自是再熟悉不过的，他本科时也教授过我们商法，的确如温院长所述，是一个豪爽而又细致，洒脱而又认真的人；至于廖师兄，因为隔着两个年级，来往自然少些，所以稍稍有些许陌生。加之当时他一言不发，酷酷的面无表情，我们这些做师弟师妹的就更觉难以亲近了。

“这是刚收到的案例，大家可以看一下。”温院长开始进入正题了，从桌上拿起两三页纸递了过来。想到以前阅读的三十多页的英文案卷，我心中暗自窃喜。

“是一个关于WTO的案例。”温院长补充到，“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

我再次环顾了一下我的同伴，除了廖师兄，其余的人都流露出与我同样的惊讶。

“你们有什么要求？”温老师捕捉到我们一致的表情，问道。

“我们请求换人。”易仁涛举起手说。我和坐在对面的吴文芳拼命地点头。

“这不是问题。你不是前不久还拿了冠军嘛？小朱今年才从WTO双学位班毕业的吧？小吴，你不是现在也正在上吗？小廖就不用不提了，本专业的人才。都没有问题的。”温院长很乐观、也很迅速地堵住了我们的第一条退路。

“你们还有什么要求？”温院长瞥见我们夹在胳膊腋下的司考书，“你们有谁在准备司考呀？”

三双手高高地举了起来。

“这也不是问题。相信你们都能顺利过关的！”温院长又果断地堵住了我们的第二条退路。

“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

我们犹豫了半晌，知道已经无路可退，却仍然硬着头皮再次举起了手臂，“院长，我们请求支援！”

“好！”温院长及时地应诺：“下次碰面，我会安排左海聪教授做你们的教练，肖永平教授、余敏友教授和石磊教授会在需要时给你们指导；另外，我会再去组织其他同学参与进来。大家再没有要求了吧？”

原来，院长早已运筹帷幄，我们就只剩下抱着钦佩之情点头的份了。

碰面结束的时候，我们四个人还没有立即散去。彼此相视，发现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同一句话：进来了就别找门了。

## 二、痛并快乐着的封闭时光

第二次碰面，是在司考结束之后。一进会议室的门，我着实吃了一惊：满满一屋子的人！温院长果然言出必行，请来了左教授并召集了国际法三方向的二十来个同学。大家对整个案例各抒己见，气氛热闹非凡。最后，决定下来三件事情：一是对诉状的书写做了大致的分工，由廖师兄负责GATT第11条与第13条的写作；我负责GATT第20条；吴文芳负责TBT第2条；易仁涛负责国际公法的相关内容；二是决定让蒋舸（02级国际经济法的硕士研究生，国际大专辩论赛中武大参赛队的一辩）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但因为有些事情腾不

出空闲就先暂时不参加诉状的书写；三是确定了陈喜峰，03级国际公法博士研究生；杨玉环，02级国际经济法硕士研究生；蔡强，03级国际公法硕士研究生作为我们的固定陪练队员。

三天之后，第三次碰面，我们各自拿出了初稿。“有点感觉了。”左老师仔细地看了一遍：“可以封闭了。”那天距离交稿日期还剩下十天。

就这样，我们住进了珞珈山庄。

不得不承认山庄要远比宿舍舒服。有热水、有电视还有免费的工作餐。但是，在大家感叹了一大番之后发现，山庄里惟独少了一样东西，也是准备比赛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东西——电脑！

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会在聚餐完毕后各自作鸟兽散，回到自己的宿舍里去用电脑。但是，武大太大了一一我们四个人又偏偏分住在不同的园区。我从山庄步行回宿舍要整整半个小时！两天后，大家坚持不住了，终于向张老师开了口。

回应是积极而迅速的。当天晚上，张老师开车送来了三台笔记本电脑——温院长、左老师和张老师把他们自己的电脑二话没说贡献了出来。

“放手用吧。”张老师又拎来几大袋新鲜水果，“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那天晚上，张老师和左老师走后，大家一直工作到凌晨三点；直至以后，每每想到那三台电脑和张老师的话，大家就都心甘情愿地工作到转点，甚至彻夜不眠。因为我们知道，站在我们身后支持我们的是多么坚实的砥柱！

山庄里的生活节奏紧张得没有一丝喘息的罅隙。白天，一边阅读各自所辖部分的材料，一边和老师队员们讨论；晚上，就要分头着笔成稿。我最高兴也是最怕的莫属讨论了，因为问题越讨论越细化，越探究越复杂；有时候，大家就一个小问题吵得天昏地暗，甚至忘记了吃饭。而我，又是个天性急躁的人，一争执起来就容易激动。幸好，每次当我开始提高分贝，甚至起身即将使用肢体语言时，廖师兄就立刻站起来按住我，大声地说：“朱琼娟，坐下！”我就回过神来，马上平息自己的语调，调整自己的情绪——这也使得我在日后的正式比赛中，能够始终以平和的姿态面对对手而不落于冲动罢。

不知不觉中，我发现我们四个人之间是多么地契合，廖师兄也并没有我们开始想象地那样冷淡，反倒是最幽默风趣的一个，每次都能毫不费力地令在座的每个人喷饭，而自己却若无其事；小师妹也不象平时显现地那样强干，反倒是大家的开心果，我们都亲切地叫她“小豆豆”；至于易仁涛，我们的易队长，他宽忍、乐天，是我们队最好的情绪调和剂。我们会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讨论案情的机会；也会在晚上从老师家讨论完问题出来后一起去肯德基大吃一顿或是一起看国际米兰的球赛；甚至一起工作到第二天凌晨。后来，蒋舸和其他陪练的队员也住了进来，那就更加热闹了。蒋舸喜欢吃零食，会买很多零食和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大家一边吃着零食，一边“吵架”。有一次，左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所有人都站在与我的对立边。虽然我势单力薄，但因性格倔强，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直到最后，大家都没有力气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在絮絮叨叨地阐述自己的理由，倒是原先持对立观点的一些队友已经倒戈进来。这时，一直静坐在一旁的左老师笑着评点了一句：“朱琼娟，你真是爱钻牛角尖。”当时，我并没有完全听懂这句话的涵义，反以为是批评。不曾想，在后来的比赛中，我发现原来我是一个这么不容易被说服的人，无论是面对对手的反诘还是专家组的提问，我都能始终坚持自己的思路与方向而不受牵制与干扰。于是，我终于明白这样的“争吵”对我的帮助有多么地大，也深切地体会到左老师那意味深长的笑容与话语……

终于，在封闭了二十来天，接连熬了一周左右的通宵后，起诉书与答辩书都先先后后地成稿了。看着自己辛苦后的成果，大家颇有一番成就感。这时，距离去北京还有十来天。

### 三、阴晴不定的进京前奏

2003年11月29日，是武汉大学110周年校庆的日子。在那一段时间里，法学院举办了“百年珞珈法学名人论坛”的活动，从世界各地请来知名教授、专家、学者无数，到院里讲学。这样十年难遇的机会，我自是倍加珍惜，几乎每场必听，从此便得了个“讲座狂”的名号，也因此对准备口头材料的工作有所疏淡；加之对所写诉状比较满意，自满情绪膨胀，大家自然都难免松懈——不单口头材料没有成稿，就连模拟也没有打过一场。校庆后的第二天，也就是临去北京的前三天，曾令良院长，连同余敏友教授和肖永平教授组织大家做了一场赛前模拟。

我们的表现可想而知。

好容易磕磕巴巴地讲完最后一句话，会场陷入沉默。各位老师眉头深锁，大家心中更是忐忑难安。

那几个小时，我们仿佛每分每秒都身处煎熬；诸位老师毫不留情地批评更令我们羞愧难当。从用语、手势到语速、音调，甚至坐姿，我们全身上下无处不成其为靶子，被一次又一次一针见血地击中。尤其是我，几乎被全盘否定。老师们走后，我心情沮丧到了极点，甚至想到了放弃。

当天下午，本来已经从珞珈山庄搬出来的我们，重又住了进去。晚上，左老师与张老师将我们领到上午受训的办公室里，又进行了一次模拟。我做的是被申诉方，仍然结巴，疲于应付。结束时，我终于忍不住了：“左老师，我认为其他队员更适合……”

“明天再打一次模拟，角色不变。”左老师不置可否。

第二天，再过一天我们就要启程进京了。因此，我们格外地珍惜时间，一分一秒都成为宝贝，一直在院里呆到晚上十二点还不肯结束辩论与提问。但是，直到那时，我们的上场队员仍旧没有确定下来。

“明天再打一次模拟，角色互换。”左老师安之若素地布置了第二道任务。

去京的当天上午，我们第三次聚在院办。

我做申诉方，仍旧结巴，所幸有队友们关爱与鼓励的目光才勉强完成。

终于，要确立人选了。

“蒋舸，你作申诉方。”

“易仁涛，你作被申诉方。”

“朱琼娟，你两边（申诉方与被申诉方）都上。”左老师看着我说。

！

我的吃惊与惶恐并不逊于面对猝不及防的摸考。我当时所能想到做到的第一件事莫过于搜肠刮肚地寻找推脱的理由：“老师，我不行的，……我结巴，……而且，混乱，……而且，其他队员比我更适合，……”

队友们开始“以眼杀我”，甚至准备“动手”了。

“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意见的举手。”廖师兄高声地提议。

哗，所有的手都高高地举了起来。

我那已跌落到低谷的心伴随着重又浮出了水面。泪水在那一刻早把心里润湿了大片。我注视着大家真诚而信任的脸孔，突然发现自己原是天底下的头号大傻瓜——在大家还没有放弃自己的时候就险些自己放弃了自己！

“你行的！”蒋舸给我一个灿烂的微笑。

“你没问题的！”易仁涛冲我点了点头。

“我们帮你们整理材料，尽我们全力支持你们！”不能上场的廖师兄与小师妹不但没有丝毫的失望，反而不住地替我们打气。

左老师看到这般情形，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的心里也分外地温暖，这才猛然发现，原来窗外的阳光是如此地灿烂！

#### 四、泪与笑交织的日子

终于，我们坐上了北上的火车。一路上，大家在颠簸的节奏中或整理辞稿，或讨论争点地度过了一晚。第二天早上，报到完毕，大家也顾不得舟车劳顿，继续工作——我们只想把我们先前浪费的时间补回来，我们真的不愿诸位老师在寄予我们厚望后再次流露失望的眼神。

晚上七点，清华大学法学院的王晨光院长大致介绍了比赛事宜和参赛的院校。回到房间，已是晚上十点左右。大家都还不肯休息，聚在左老师的房间里，拿出问题继续讨论。一贯早睡的左老师强打起精神进行评点；张老师买来牛奶给大家煮上，又坐在一旁削梨、剥柚。这番情景，于我之感动，已非语言所能描绘。

第二天上午，与我们第一个对垒的是复旦大学法学院，我们作申诉方。复旦的队员们道理倒是讲得透彻，只是在辩论阶段自动放弃剩余的时间，实为可惜。我们也只是险胜一筹。

第二场，与华东政法大学对阵，我们作被申诉方。这一个下午过得可不轻松。三位专家，王军老师、史晓丽老师与徐炳律师，甚是活跃，所提问题不但尖锐，而且艰深。好在我们平日的讨论中也有涉及，所以并不慌乱。后来，史老师在 TBT 部分发问易仁涛：“什么是技术标准？什么是法规？”问题简单，无非是概念的表述，然而临场的突发其问，易仁涛一时也找不出相关的依据，而乌拉圭回合文本此时就摆在我的手边。

“请问这位专家所问的是技术法规？还是技术标准？要知道，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赛场上哪怕十秒钟的停顿也是难堪，我只好想尽办法地弥补沉默。

史老师低头稍稍思考了片刻：“是技术标准。”

这思考的霎那，便足够我翻到文本的那一页并递到易仁涛的面前。史老师话音刚落，他便响亮而清楚地给出了答案。

当首席裁判员王军老师宣布本场辩论结束时，我瘫在椅子上，累得动弹不得。易仁涛握了握我的手，说了声“谢谢”。老师和其他队友们走上来，拿出刚才记录的小本子，一一指出我们的可圈可点之处和在回答问题中所犯的错误。坦白而言，我当时只剩下“哼哈”应承的气力，真想倒在柔软的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

等了半晌，结果终于出来了。我们第二次胜出，这意味着我们将顺利进入明天的半决赛——我们已经漂亮地闯过了第一关！

晚饭时，不能喝酒的左老师也放怀痛饮了几杯“小二”（红心二锅头）。这次，他给我们布置的任务是“睡觉”。回到房间里，本已浑噩匮乏的我却怎么也睡不着，蒋舸也是如此。于是，我们二人不约而同地从床上爬起来，拧亮台灯，开始对每个问题重新进行梳理。

但是，在蒋舸连续打了好几个喷嚏后，我意识到有些不对劲了：“你感冒啦？”

蒋舸无奈地点了点头。

“回床睡觉！”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别折腾自己！现在睡觉！”我强行关上了灯。

蒋舸就是这样一个人。只是她若在赛前病倒，将不啻于对我们队伍的重创。想到这里，自己就怎么也睡不着。一看表，九点一刻，再过四十五分钟，进入明天半决赛的前四名即要公布。一想到这，我便偷偷爬了起来，叫醒易仁涛，一起去了明理楼。

除了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也相继进入了半决赛；而我们明天将要面对的，正是我们的东道主，本次比赛大陆地区的主办方——清华大学。我们作起诉方。

回到房间里时，蒋舸早已坐在桌前看我们的诉状。

“我们又作起诉方。”我缓缓地开了口。

“知道了。”蒋舸一边擤着鼻子，一边点头。

“吃药没？”我不知怎样继续对话。虽说感冒并非大碍，可终究不轻，明天的比赛又是极重要的关口，不知她可否撑得下去。

她摇摇头：“不吃。怕睡觉，就不清醒了。”

听到这里，我真想上去紧紧地拥住她。经过一天的比赛，大家早已疲惫不堪，莫说我们这些上场的队员，就是场下的廖师兄和小师妹，也已是精力憔悴。现在，唯一支撑着我们的，就只剩下这坚持到底的信念了。

晚上十一点，我们拿到了对方的答辩书。谁也没有心情睡觉：张老师与易仁涛、吴文芳一道整理专家组的提问；而左老师、廖师兄则与我和蒋舸一起剖析对方的疏漏，研究对策。就在讨论如何对“限制措施”进行批驳时，我们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眼看已近转点，大家仍然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终于，我忍不住，站起了身。

“朱琼娟，坐下！”廖师兄大声地呵斥了一句。

倘若放在平日，我必是立即打理情绪；然而那晚，一直以来背负的压力，连续几晚的缺觉，坚持己见的顽固，迫在眉睫的比赛，困顿、忧急与莫名的紧张一股脑儿地涌上心头。我再也忍不住，冲到隔壁的房间里，看到张老师他们还在认真地整理，更觉不是滋味。

“怎么，讨论完了吗？”张老师笑咪咪地问道。

“没有。”

“没有？到这来干吗？”

“不干吗。”

房间里所有的人都放下笔，不可理解地望着我。

“我不想参加比赛了！不想参加比赛了！”我的情绪终于还是爆发了。开始号啕大哭起来。我本来只是赌气，没想到自己还要闹情绪闹到所有人都不得安宁，心中越想越难过，哭得愈发收拾不住。

大家开始手忙脚乱了起来。张老师、廖师兄和小师妹还有其他人轮番陪着我，开导我。好半天，我的眼泪才停住。不过，坦白说，这么酣畅淋漓地发泄一通，反倒觉得神智清爽了许多。自己又觉得不好意思，就自觉地拿起诉状继续钻研起来。不知不觉，又过了四个钟头，大家才各自回房睡觉。难为小师妹，仍然陪着我和蒋舸，仔细听完我们最后的演练才回房歇息。

那时，已是凌晨四点。

一大早，照例接到张老师叫起的电话。梳洗时，听到易仁涛说廖师兄整理争点今早六时才睡时，我对着镜子里双眼浮肿、面目憔悴的自己说，哪怕是倒下，也要坚持到比赛结束后再倒！

那场比赛，如易队长所说，是最惨烈的一场比赛。

清华大学派上场的是两位伶牙俐齿的女生。专家组也是极强的阵容：巩沙老师、杨自然

老师与宋英老师，尤其是宋英老师，问题如连珠炮般地抛出，且个个命中要害，让人难以招架。所幸蒋舸大多能应对自如。她的这份从容感染到了我，使原本已近乎昏聩的我重又打起十二分的精神，镇定迎战。

然而，宋老师好穷追猛打，对每个问题都要追问到底。眼看蒋舸被她的一个问题纠缠不放时，着急了半天的我终于找了一个间隙插进了话：“谢谢这位专家的提问，我可以对我同伴的回答作一些补充吗？”

“可以。”宋老师微笑着点头。

……

但是，问题出现了。我们在专家的提问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以致于忘记了事先计划的时间分配。蒋舸在完成 GATT 第 20 条的论述后，我只有 2 分钟阐述 TBT 的内容；在反驳部分，我也只剩下 1 分半钟的时间。结果，我准备重点抛出的批驳也腹死胎中。

比赛结束后，专家们进入专门的房间里讨论评比。那短短的几分钟，仿佛几个世纪般地漫长。我重新感觉到沮丧，蒋舸一脸抱歉地望着这边。我起身走到洗手间，擦去眼角的泪，努力压制自己一触即发的情绪。

专家们终于回到了场上，开始了例行的评点。

“申诉方的两个队员表现得很不错，特别是第二位队员及时地补台，体现出队员之间的配合意识。……”宋老师依旧微笑着，清晰有力的字句，却让已身心俱疲的我分辨不出到底是真心的肯定亦或对失败者的最后安慰。

终于，宣布结果了。

“申诉方胜出。”

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却如鼓槌般击震着我的耳膜。我再也忍不住，捂住脸“哇”得一声哭出来。我很少有这么原始的哭态——也许是缘于以前很少有这样充分地肆意与率性——一切得来都太不容易了……易仁涛拿着大衣立刻冲上来，想遮住我的这副糗相。不曾想，我的情绪早已感染到其他的人。

“朱琼娟，我们抱一下吧。”蒋舸说着，一把把我搂在怀里，放声大哭，“下一场我们一定会配合地很好的！相信我！”小师妹这时冲过来，拍拍我们的肩，眼泪落下来。于是，三人紧紧抱成了一团……

直到后来，这副场景仍然像烙印一样深深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回校后在院里召开的表彰会上，再谈起与清华的那场比赛时，左老师也忍不住在台上哽咽起来：“看到两位队员面色黄黄地坐在台上，坚持着打完，后来大家都哭成一团，我很心疼……我们的队员付出地太多了……”从此，我这个“十一个小时内哭了三次”的典故就在同学们中间流传开来。而每次说起此事，廖师兄就会拍拍我的头：“够本了，一年的眼泪一天就流光了。”我会极不好意思地低着头，任由他们戏谑，一门心思地欣赏照片上我那灿烂无比的笑脸却衬着又红又肿的双眼的古怪模样。发现只有在泪水中浸泡过后的欢乐才能带来这样无穷的回味；而那一天，那感情激荡、悲喜交织的一天才会带给我如此刻骨铭心的记忆。

也就是这样，我们闯过了第二关，进入了决赛。

决赛的对手是西南政法大学，我们仍做起诉方。

开赛前，队长和师兄就三番五次地“警告”我，如果再像上午那样大喜大悲，就拒绝“认识”我。我独自偷笑，其实，经过前几场泪水的洗刷，心境早已平和了不少。我现在唯一所需要做也是所能做的——就是坚持到比赛结束再倒！

那天下午，决赛在明理楼最大的模拟法庭里按时举行了。杨国华专家致开场词时幽默风趣地说要学会“讨好”他们，而杨征教授也强调要保持“平和”的姿态。我注意到台下的张老师对我做了个下压的手势，我知道他是在告诉我要注意控制自己的手势。我点了点头，自

第一场比赛的何美欢教授指出我的手势有些过大后，我就一直努力克制手势的幅度与次数——辩论不仅是道理的阐释，心理的较量，更是一切语言的艺术——一切所能注意到的细节都必须力求完美。

对于那场比赛，我想说的第一句话是，灯光好炫。我的思维好几次都险些游离；准确的说，是已经在游离。于是，我的心里又生出急躁的妖魔，愈是着急把问题讲清楚，反倒欲速则不达。然而，就在最后阐述的几分钟里，我发现，三位专家都已面向我，在聚精会神地聆听，不时微笑点头。突然之间，我仿佛触摸到了那追寻已久的感觉，那安静温和的气质，那心平气和的说理。不知不觉中，心，安定了下来；激扬的语调也渐趋平静。

我找到了那种感觉！我顾不得记起原来准备的是如何的说辞，我早已对案件再熟悉不过，我是怎样地理解！我是怎样地积累！我应该怎样地表达！我注视着专家们，身体稍稍向右侧前倾；我微笑着；我告诉他们的是全身心进入到申诉方代理人这个角色后的立场，是完全自我而又超我的想法，是已经忘却这只是个模拟表演而彻底地当作是一场真正的法庭辩论的投入与释放！

我讲完了！

我却不愿说结束——那种感觉仍在延续。

……

宣布结果前，我却没有了惯常的猜测与忐忑。输赢早非我所在乎，我找寻到了我所想找寻的，便是足够。

终于，武汉大学胜利了！而我也终于能应现队友们的要求，没有“大喜大悲”。倒是左老师与廖师兄，据小师妹说，就在结果宣布的那一刹那，他们的眼角有泪光闪烁。面对桌上摆成一排的金灿灿的奖杯，我拍着手，用力地点着头——我们真的要肯定自己，我们真的是太棒了！

## 五、不吐不快的心理话

再后来的就是第二天晚上与台湾地区来的冠军队，台湾政治大学进行的表演赛。大家在融洽而又不失幽默的气氛中结束了首届“理律杯”所有的赛事。那天，曾院长特地提前坐飞机赶到了清华。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天上午，我们一进房间，他就走上前，紧紧握住我的手：“法学院的英雄们哪！”

我看到他舒展的眉头，我这才悟到，倘若不是他们那天上午的训斥，我们又何来如此的压力与努力；倘若不是他对我的那番训斥，又何来我如此的潜力与勇气。机缘，本是玄不可言，或是注定，或是人为，一切，就只有天知了。然而，无论是何种的答案，我所要做的惟有满心的感激。感激一切身处机缘却又推动机缘的人们，感谢这些人们在机缘之下所做的一切付出，感谢一切付出之后所收获的硕果，感谢硕果之中所蕴涵的一切新种，感谢新种之上发现的一切真理方向，才有了我再一次心智健康的成长。

这次的比赛，我所收获的已远非我想象：不止是满载而归的荣誉，不止是金石不换的友谊，不止是导师的教诲，知识的掌握；更是一种心态的洗练。正如离京前的头天早上，我们去了北京的世纪坛。在艺术展览厅里，我在一幅题为“无上清凉”的书法前，驻足了很久。方方稳稳只四个字，却包含了无限深意；也可巧与我追崇平和的心态契合。

我想，这也正是我从这次比赛中所悟到的最大收获罢。